

知识分子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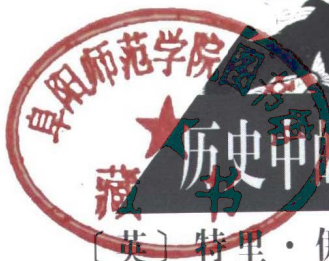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 马海良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分子图书馆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英] 特里·伊格尔顿 著 马海良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英)伊格尔顿(Eagle ton, T.)著;
马海良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8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559-7

I. 历… II. ①伊… ②马…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
理论-文集 IV. I10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31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5 插页: 4

字数: 315 千字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21.00 元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知识分子图书馆》部分书目

- ①文学行动* 雅克·德里达
- ②解构之图* 保罗·德曼
- ③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 斯坦利·费什
- ④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 莫瑞·克里格
- ⑤快感：文化与政治*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⑥布莱希特与方法*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⑦论解构* 乔纳森·卡勒
- ⑧重申解构主义* 希利斯·米勒
- ⑨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 冈特·绍伊博尔德
- ⑩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 罗钢 刘象愚主编
- ⑪抵抗的文化政治学* 谢少波
- ⑫后革命氛围* 阿里夫·德里克
- ⑬赛义德自选集* 爱德华·赛义德
- ⑭政治无意识*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⑮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 特瑞·伊格尔顿
- ⑯本雅明文选* 瓦尔特·本雅明
- 文化研究读本 雷蒙德·威廉斯等
- 历史和人文科学中的历史 拉尔夫·科恩主编
- 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 布鲁斯·罗宾斯
- 后现代性的起源 佩里·安德森
- 吉尔·德勒兹：哲学戏剧 米歇尔·福柯等
- 介入的区域 佩里·安德森
- 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 佛克玛主编
- 性贸易及其政治经济学 《社会文本》编辑部
- 狱中札记 安东尼奥·葛兰西

(注有*的已出版。)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

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

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

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焯、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 于北京

前 言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是一位具有国际声誉的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现为英国牛津大学凯瑟琳学院沃顿英文教授。从六十年代后半期以来,在众术纷纭、空前繁荣的当代批评话语领域,总能听到伊格尔顿那强劲有力、发人思考的声音。他对意识形态和文学生产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英文研究”传统的精辟分析,对现代各种文化理论的适时批判,以及他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和丰富而扎实的批评实践,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成为当代西方最富实绩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

思想历程

伊格尔顿的思想历程是从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问题框架开始的。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初版于1958年,六十年代以后,企鹅出版社重印了几次简装本,使之广为流行。这是英国文化理论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开启了注重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从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来诠释文化的新方向,形成了时至今日仍然非常活跃的一派学说,或曰“文化唯物主义”。《文化与社会》考察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以来的文化批判传统,追溯了这一传统在威廉·考贝特、马修·阿诺德、约翰·罗斯金以及威廉·

莫里斯等人的著作里所展现的“文化”一词的语义史，指出“文化”的语义嬗变史就是包括了“阶级”、“工业”和“民主”等词语的社会史。他还对战后社会助长文化不平等历久不衰的政治经济结构提出了有力的批判。威廉斯理想中的文化不是由少数几个聪明的正派人建构和分发、由老百姓接受和体验的“精英文化”，不是将现有价值和意义从一个阶级转授于另一个阶级手中的静态物，而是不仅被共同地占有、而且被共同地参与创造和共同地控制的“共同文化”。威廉斯的理论表现出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伊格尔顿是威廉斯的学生，在伊格尔顿到剑桥读大学本科的那一年，威廉斯被任命为英文系的讲师。1964年伊格尔顿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与威廉斯同在剑桥的基督学院教书，并在威廉斯的指导下开始学术研究。伊格尔顿初期的批评观念深受老师的文化理论的影响，比如他早在1967出版的《莎士比亚与社会》(*Shakespeare and Society*)，其书名就显露出“文化与社会”的视界和方法。这部专著是题赠给威廉斯的，的确，书中试图打破个体与社会、自生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界线的做法显然来自他的老师威廉斯；他后来的文化政治批评方法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因为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进行创造性和持续的对话而得到养分的。他与威廉斯既师承又反拨、既影响亦突破的理论关系，从选入本书的《什么是共同文化》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像威廉斯一样，伊格尔顿所指的“文化”宽泛地包含了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和学术著述到所谓的“情感结构”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多种意义，当然更重要的是诸意义之间的相互关联。他发现，在浪漫主义初期，这些不同意义既有各自的界限，又相互联系，作为想象创造活动的文化与作为一般生活经验的文化是相互承转的，作为艺术、价值、风尚以及信念的文化与作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具体形式的文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它们是一枚文化硬币的两面。然而，浪漫主义的文化观念在19世纪初期渐显裂痕，体现人类理想价值的文化竟然逐渐脱离了它本来出自并准备影响的社会现实，文化诸

意义之间失去了联系。这种状况一直到威廉·莫里斯才显示出另一种方向和可能性，而雷蒙德·威廉斯的理论则是这一传统在当代的继续和发展。应该指出的是，伊格尔顿即使在这篇深深打着威廉斯印戳的论文中，仍然表现出他独特的个人印记，其中有些特色一直保持并发挥至今天，让人觉得他一开始就是文化政治批评的实践者。比如，强调从英国社会所经历的实际变革中理解十九世纪的“文化与社会”论争与当代论争的连续性，在此基础上，才可能创造一种“最完整意义上的”共同文化。伊格尔顿并没有明细地描述这种文化的构成，因为他热情饱满地肯定这是一种比自由主义理想的文化“更丰富、更多样、更开放、更灵活、更自由”的文化，因为这种文化不是完成了的静物，而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集体实践中“不断重新创造和重新定义的整个生活方式”，是一个“充分的民主过程”；他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此外，伊格尔顿对自由主义作家尤其是 F. R. 利维斯和 T. S. 艾略特的批判，无论就主题还是风格而言，都为他以后的理论活动标出了一个方向。他后来对剑桥派“英文研究”和艾略特们的精英姿态进行了猛烈的不依不饶的批判。另外，伊格尔顿在本文中使用的引对手进入自我讽刺的尴尬境地的策略，在他后来的写作中也是应用自如，屡试不爽。无疑，这一阶段对于伊格尔顿思想的发展和构成是十分重要的。

1976年，伊格尔顿出版了《批评与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两部代表作，引起很大反响，被普遍看作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两部著作反映了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问题的集中系统的思考，这与当时的历史现实条件有关。七十年代前后，越战硝烟未去，北爱尔兰的反帝运动如火如荼，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变自身生存状况的斗争风起云涌。这一系列事件使左派改良主义显得无能为力，左派思想家们迫切需要理论上的更新，以解释新现象，解决新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尔图塞对马克思主义

的结构主义阐释进入英国，引起英国激进左派知识分子的热情回应，形成70年代中期与整个欧陆形势相呼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繁荣时期。阿尔图塞思想的核心是剔除掺入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形形色色的“非科学”因素，倡导反人文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人文科学影响尤大的是阿尔图塞对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特殊作用力的坚持和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他认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截然不同，因为它根本不是一种意识形式，而是人类依附于他们真实的生存条件的一种无意识的或想象的关系。不过，意识形态是具有独特逻辑和规律的表象体系，不仅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而且作为历史发挥着实践的和社会的功能，是一切社会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阿尔图塞思想一方面可以使英国左派知识分子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使他们摆脱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反映论的束缚，再者也使他们能够与总是纠缠着自身的英国自由人文主义划出一个清晰的分界。的确，新的理论方法使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开篇部分首先与威廉斯的“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划清界限，语气之坚决竟然被戴卫·洛奇形容为“有些俄狄浦斯的味道”。^①伊格尔顿承认《文化与社会》是“英国有史以来最具启发性和最精到的社会主义批评实绩”，^②对威廉斯在缺乏学术制度支持和理论资源保障的情况下几乎是单枪匹马的理论努力表示理解和赞赏，但是对威廉斯作品中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有机主义美学和政治渐进主义提出了尖锐批评，甚至说威廉斯顶多是一个左派的利维斯主义者。当然，《批评与意识形态》的重点不在批判，而在建构批评理论的概念系统，用理论概念表述文学构成及其与文学所由产生的意识形态构成之间的关系结构。作者首先着重考虑了文学批评

^① 参见 David Lodge (ed.),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A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8), pp. 384—435.

^②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Verso, 1978), p. 24.

构成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在细致地重新梳理了阿尔图塞和皮埃尔·马歇雷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更为动态的意识形态理论。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远不只是一些自觉的政治信念和阶级观点，而是构成个人生活经验的内心图画的变化着的表象，是与体验中的生活不可分离的审美的、宗教的、法律的意识过程。伊格尔顿接着提出了兼顾一般生产方式（经济）和文学生产方式以及诸多意识形态成分（整体，作者，审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我们认为很有意义的是，他并没有把文学文本与一般生产方式直接地对应起来，而是更注重（对于文学批评而言）意识形态的中介层，当然，这个中介层绝不是板结的等待主观去反映的客体。在他看来，文学文本反映（如果仍然要用“反映”这个词的话）的并不是历史实在，而是反映了产生“现实影响”的意识形态的作用情形。同样，文本不是一种自足的封闭的“有机”本体，而是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一个动态和开放的表意过程。因此文学的真实性不是说它“反映”了历史的实在，而是说它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展示了某种历史的真实。《批评与意识形态》对建立一门马克思主义“文本科学”进行了认真的尝试，这种试图把符号语言学方法与唯物主義的历史概念统一起来的“文本科学”，表现出与乔治·卢卡契的“总体论”和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的反映论的巨大差异。伊格尔顿后来对他的“文本科学”进行了一定的反拨，但是现在看来，《批评与意识形态》在建构中已经包含着一定的“解构”因子，这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当然，他的那种“解构”灵感并非来自雅克·德里达。

如果联系到伊格尔顿直至九十年代后期的思想看，《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另一个重要之处在于亮出了作者后来著作中的一个突出特色，那就是他的关注焦点越来越集中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上。应当说，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的重要标志和突出成就就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直至九十年代，他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仍然是澄清并完善

他的意识形态概念,这一方面是伊格尔顿本人的理论倾向使然,另一方面也因为其时某些理论圈子中正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出版于1991年,这部专著囊括了这个概念的不同历史谱系。在第一章,伊格尔顿摆出的意识形态定义不下十六种,既有“社会生活中意义、符号和价值的产生过程”,也有“社会生活转变为自然现实的过程”。^①对这种意义不稳定性的考察使他进而探究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的一些重大争论,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卢卡契、葛兰西和阿尔图塞等人。他指出现在最大的矛盾是,在一个明显受到意识形态斗争折磨的世界里,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竟然在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思想中似乎成了过眼烟云。按伊格尔顿的推测和解释,对意识形态的降格处置与后现代主义对真理和再现所抱的怀疑主义态度有很大关系,也与理性、利益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全面重组密不可分。“意识形态”成了伊格尔顿据以对抗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岩和他的文化政治学的核心范畴。显然,“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的中心概念之一。

尽管伊格尔顿在建构“文本科学”的过程中,经常提醒“历史是文学的最终能指,正如它是最终的所指”,尽管它的实际目的是批判尤其在十九世纪作家身上表现突出的社会“有机论”和美学“有机论”,批判他们企图以此掩盖或解决历史冲突,但是阿尔图塞思想对“理论中心地位”的固守和结构主义专注于系统“内部的表意过程”的方法论特性很难使不忘现实问题的伊格尔顿安心地在“科学的”理论话语中长久盘桓下去。他很快就感觉到“文本科学”研究的危险在于,把主体和政治关怀以及实际的阶级斗争这些重大主题推到了边缘。而且现实的情境是,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纷纷以差异性和多元化为口号,不遗余力地拆解主体,放逐主体,复杂的政治现实仿佛顶多是些无关痛痒的伦理问题。

^① 参见 Terry Eagleton, *Ideology: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p. 1-2.

1981年《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的出版标志着伊格尔顿从文学文本向文化文本、从“科学”体系向“政治”实践、从概念分析向实践主体的重大转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回归，在更高意义上的回归。^①如书名所示，伊格尔顿的这次“走向”来自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或历史时间哲学的启发。与历史主义者不同，本雅明认为历史时间并不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按目的性原则连接起来的直线，不是“进步”在其展开过程中的一个时刻，也不是各种事实前后递进中的一部分。相反，时间凝结于“现时”（Jetztzeit）这个启示点，打碎板结的貌似连贯而实则虚假的历史叙事，使“过去”在回溯中展示出新的意义，或者说对传递给它的无数遭受压抑和歪曲之后的支离破碎的意义进行整合和重构，以理解其真正的意义。显然，“现时”是一个摧毁和建构的时刻。比如寓言，就是对象征的挑战，摧毁了它的那种虚假的总体性，把它从特定的语境里拽拉出来，放入重新建构的意义构成。由此，本雅明指出，作者的活动是精心安排的；这样，主体就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从“自然”的压制进入“自由”的摧毁，从对历史神话的迷恋转为对历史予以世俗化的重构。本雅明思想的革命性在于，以欢快的声音宣布“历史是从恶的一面前进的，如果有一条越过物化的路，那就是穿过它，而不是绕过它”。伊格尔顿把本雅明的著作与英国文学批评联系起来，把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对十七世纪悲喜剧（Trauerspiel）或巴洛克寓言的研究与艾略特和利维斯对十七世纪诗歌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对照，指出艾略特和利维斯所称的“感受力的分离”（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流露出对有机论和十七世纪英国特定意识形态的膜拜。他提出本雅明对“悲

^① 应当说明的是，这里说的“重大转变”并不等于“根本改变”，也没有“反悔”的意味。事实上，《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的许多观点是他以至后来的整个思想构成中的必要部分，例如他的意识形态概念、文本概念，以及对英国现代文学的批评等。伊格尔顿本人后来也坚持认为他的“文本科学”尝试是一种十分必要的“理论资本的投入”（参见他的 *Against the Grain, Preface* (London: Verso, 1986)）。